



□ 纪连海

管仲的治世“三观”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当中多次引用管仲名言。管仲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重点研究的历史人物。管仲的为政有诸多首创之举：他主张富民强国，一个区区小国居然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开春秋霸业，纵横四十年无敌手。他最早懂得宏观经济调控，故设“轻重九府”；他实施“相地而衰征”，实行土地承包经营；他“兴市劝业”，以市场作用带动就业；他“睦邻慎战”，实现和平崛起；他的重民思想被后来的儒家所宣扬；他的“明法审数”被后来的法家所传承。管仲深受孔子、司马迁、诸葛亮、李白，以及政治家房玄龄、魏征等历代先哲的推崇。梁启超评价管仲为“国史上第一流人物”。管仲的治世之策与图强之略，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传承至今。

人才观

众人拾柴火焰高。管仲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但离不开背后强大的群体支撑。正是有了一批各有所长、尽忠职守的出色人才，诸如鲍叔牙、高偃、国懿仲、隰朋、宁戚、宾胥无、东郭牙、王子成父等人在管仲周围，创造性地执行桓公、管仲的决策，齐国的霸业才最后走向了成功。

管仲向齐桓公提出：建成大厦，决不能单凭一根木材；汇成大海也决不能仅靠几条涓涓细流。君欲成就大业，必须任用五杰：举动讲规范、进退合礼节、言辞刚柔相济，我不如隰朋，请任命他为大司马，负责外交；开荒建城、垦地蓄粮、增加人口，我不如宁戚，请任命他为大司田，掌管农业生产；在广阔的原野上使战车不乱、兵士不退，擂鼓指挥着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成父，请任命他为大司马，统帅三军；能够断案合理公道，不杀无辜者，不诬无罪者，我不如宾胥无，请任命他为大司理，负责司法刑律；敢于犯颜直谏，不避死亡、不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他为大谏之臣，主管监察谏议。

可以看出，管仲推荐人才的理念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出于公心，从事业角度选才。管仲之所以向桓公推荐五杰，最重要的原因是社稷的需要。管仲认识到，国家要图强，仅仅靠桓公的支持和自己的谋划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大批人才来群策群力；光有正确的决策，没有具体的行动是很难支撑的，还需要有一大批实干家来落实解决；治理国家是一个系

统工程，仅仅有一个方面的人才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等方方面面的能人。基于此，管仲才向桓公推荐了五杰。事实上，五杰均与管仲个人交往不深，多与管仲素昧平生。由此可知，管仲完全摒弃了个人私利和感情因素，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为国选贤。

二是注重人才的群体效应。管仲之所以推荐五杰，潜意识里有这样的理念：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完成宏图大业，就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就必须有一个充满智慧的群体来作为基础。这一点不仅仅说明管仲的品德高尚，有容人之心，而且说明管仲在智慧上的过人之处。领导能重用一两个人不算本事，能重用一批人，注意发挥群体效应，才是真正的事本。

三是注重用人所长。在管仲看来，人才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王子成父是军事人才，你叫他干外交就是强人所难；东郭牙性情耿直，干监督可以，干外交就得和外国天天闹别扭。所以把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使其人尽其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管仲在向桓公推荐五杰的谈话中，真诚热情地赞美了五个人的长处，对五杰充满了信任和期待。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让桓公相信自己的推荐，他竟然连用五个“我不如”来强化桓公对五杰的重视程度，一片赤诚，由此可见。

四是准确地定位自我和人才之间的关系。管仲向桓公推荐五杰的谈话结尾，很耐人寻味。管仲既客观地分析别人的优点，认为他们在具体领域内的才干超过自己，又客观地分析自己的优点，摆正了自我和人才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自己和五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创造了良好条件。

五是用人不疑。从五杰上任后政绩突出、表现优异、功勋卓著的事实可以看出，在使用人才的过程中，管仲用人不疑，善于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制度观

管仲被拜为相国之后，辅佐齐桓公执政齐国四十年，将地处边远、弱小、贫穷的齐国发展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强大国家，齐桓公因此成为春秋第一霸主，这完全得益于管仲对齐国所实施的一系列行政制度和优化举措。

首先实行了国野分治。本来，西周就有国都和鄙野之别，但此前的齐国未

实行。这次管仲就把齐国分成“国”和“野”。其中，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士居十五乡，工居三乡，商居三乡。每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对于野，以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属大夫分别治理。并划分各级官员的职权范围，要求他们兢兢业业，不许荒废政事，不然处以刑罚。每年正月向桓公汇报述职。

国家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与此同时，管仲推行礼法并重，即推行道德教化。

其次通过行政制度的优化来加强军事。管仲主导实行了兵民合一制度，规定士乡的居民必须服兵役。每家出一人为士卒，每轨为一伍，每里五十人为一小戎，每连二百人为卒，每乡两千人为一旅，五乡一万人为一军，十五乡共三军。齐桓公、国子、高子三人就是三军元帅，齐桓公率中军，国、高二氏率左、右军。这样就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农闲时以狩猎来训练军队，有战事时出征。这样既提高了士兵战斗力，也不必支付养兵的费用。同时，管仲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为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规定犯罪可以用兵器赎罪。犯重罪可以用甲和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盾和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金属赎罪，铜用来铸兵器，铁用来铸农具。诉讼成功则要交一束箭。从此，齐国的兵器也渐渐充足起来。

经济观

管仲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这是他发展经济的第一项措施。“衰”的意思是等差，“征”是对农民的地租，不是对于奴隶主贵族的税。就是说，按土地的好坏，分成等级，对农民按等级收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同时，管仲还提出了“井田畴均”“无夺民时”的指导原则。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具体如何实施呢？“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

税。”就是说，每两年收一次税，丰年的税率是十分之三，平年十分之二，差一点的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税，等到灾情缓和之时收税。

发展经济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实行“官山海”的垄断经营政策。“官山海”中的“山海”，意是“山海之藏”“山海之业”“山泽之利”，主要指藏于大海中的食盐和藏于山岭中的铁矿两项重要资源。“官山海”则是实施制盐业和冶铁业的国家垄断性经营，实施食盐和铁器的国家专卖。这种“官山海”的政策及其实施，表面看来国家没有另外增加税种或提高税率，不致引起社会民众的骤然反对，实际上通过盐铁业产销的政府垄断性控制和运营，对盐铁生产者以及消费者进行了普遍性和强制性的掠夺，很隐蔽很巧妙地获取了巨额财政收入。“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垄断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发展经济的第三项措施是实行宏观调控政策。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稳定物价。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管仲还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二是垄断货币。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所以，国家必须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三是控制流通。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本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四是藏富于民。管仲说过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何实现“富民”的目标呢？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当然，管子不仅重视农业生产，而且也十分重视工商业。这正是他比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管仲的经济政策，使齐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为齐国在日后的争霸战中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上接1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城乡发展差距持续缩小。城乡要素流动障碍逐步破解，全国大多数城市全面放宽开放落户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明显；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基本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有序推进；财政资金持续向农业农村领域倾斜。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提升，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

工农城乡关系的深刻变革为城乡融合发展创造了新的现实背景。从“城乡一体化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我国城乡空间、人口、产业结构不断重组，城乡生活、生产、生态功能逐步重塑。从城乡供需互动看，乡村是提供农产品保障的重要来源，农业的多种功能和乡村的多元价值加速彰显，拓展了城市居民对乡村的消费需求。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加快推进，释放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从城乡要素流动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持续深入，加速了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城乡产业、就业、资源协同发展的趋势增强。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程度加深，信

科学把握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路径选择

坚持系统集成，协同推进城乡各领

息化带来空间资源配置方式、城乡联动模式、时空交换效率的变革，催生了工农城乡关系新的变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打破堵点难点的强劲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融合发展一系列成效的取得，是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逐步破解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体制障碍的重要成果。面对新时期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目标追求，以及仍然存在的阻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障碍壁垒，亟须下大力气通过深化改革攻克堵点和难点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四个方面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等制度安排，将城乡融合理念融入城乡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为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结构、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城乡居民创造了制度条件。

域改革联动。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将城市和乡村发展一体设计、一并推进，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等战略部署，从城乡规划、建设、治理等多个维度通盘谋划，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协同联动。着力打破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跨部门、跨层级合作的现存障碍，积极开展城乡融合发展改革集成试点工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系统集成探索实践模板。通过政策举措、工具组合、平台载体的集成创新，解决好城乡融合发展相关政策与实践落实存在的碎片化、不协调、不配套等问题，形成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大合力。

优化要素配置，打通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通道。遵循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决定机制，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联动，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自由流动，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大市场。“人”的方面，进一步放宽放开落户限制，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引导不同领域的城市人才参与到乡村振兴之中。“地”的方面，继续深化“三块地”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钱”的方面，继续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

领域，加大金融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引导和鼓励工商资本投入乡村建设、生态治理等领域。此外，注重发挥数字技术以信息流带动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物资流的驱动作用，使其成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新动能。

强化县域单元，加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将县城作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以规划一体化促进县城城乡空间融合，优化完善县域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生态保护等空间布局，推动形成城乡互补互利互融、共建共享共荣的发展共同体。依托特色资源优势或承接大中城市功能疏解，大力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做大县域经济蛋糕，通过产业链农、资源富农、以工带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补齐县城市政、物流、能源、水利、通信等设施短板，做强县城枢纽型基础设施，提升中心镇村建设水平，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镇院之宝”何尊上的铭文，除了著名的“宅兹中国”以外，还有个引人注目的“隹王恭德”。与甲骨文中的“德”相比，这个“德”字右下角多了一个“心”，这也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带“心”的“德”字。

殷墟出土甲骨文中的“德”字，有几种字形，但都没带“心”旁。值得注意的是，周初的德方鼎、德鼎、德簋、弔德簋等“四德器”，其铭文中的“德”字也没有“心”旁，说明铭文“德”与甲骨文“德”一脉相承。加了“心”的铭文“德”，是因为随着时代发展，德的内涵有了新的延展。

历来专家对甲骨文中的“德”字解释不一，除了将其认定为“德”字，主要还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是“直”，引申出“值”“值”等，“直”的大意是正，行而正之，征伐之正；一派认为是“省”，引申出“循”等，大意是巡视、巡守、巡狩。其实，无论哪种解释，都不能否认其为“德”字的前身。

首先，“直”下加“心”，就是后世的“惇”，同“德”，是德的异体字。而且《尚书·洪范》里讲到的“三德”之一，就包括“正直”。其次，将“德”解释为“省”“循”，与商代的商王巡守的军事政治制度密切相关。这要把甲骨卜辞中的“德方”合起来讲，德方就是直方，商王到方国巡视，要带着一定的军队用来炫耀武力、保护自身安全。这种方式不同于军事征服的血腥杀戮，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具有怀柔远人、顺天应命的意识。

何尊铭文“隹王恭德”中的德多了一个“心”字，这既体现了商周文字的演变，也代表了西周统治者民本意识的觉醒。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德”字尚未演化出后世“道德”的含义。据古文字学家研究发现，这里的“德”与“典”字同义，指的是祖先之法。对于商人而言，指商代建国之初政治清明、行王道时期的成汤之典；对于周人来说，就是文王之典。“德”字出现在很多西周铭文中，比如，大孟鼎铭文中的“今我唯即型稟于玟王正（政）德”，鬲公盃的铭文中出现6次“德”，还有毛公鼎、史墙盘等青铜重器，也都提到“德”。

周人眼中的德，有了新的升华，认作“天命”“大命”。在周人的逻辑里，周本来是小的方国，却取而代商，统治天下，上天为什么将大任交给周人？因为遵循了天命。周公在《康诰》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齔寡，庸庸，衿衿，威威，显民……”，他把“明德慎罚”视为文王受天命的最根本原因。而天命在哪？周人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天命在民，衡量“德”的标准就是看有无百姓支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种新的天命观，已迥异于商代。商人崇拜自然、敬事神灵，发展出一套具有浓厚宗教神秘色彩的思想。不只是青铜文化，包括商代的甲骨文、礼制、天文、历法、音乐等文化成就，都源于“尚鬼神”。周人吸取了商代亡国的教训，摒弃了商人观念中重鬼神的思想，轻神重民的理性色彩日益凸显，并由此发展出一套思想和实践体系，其基础就是德，其表现就是礼。

“德”字的重民理念在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中得到了印证，其中有《厚父》一篇，以夏遗民厚父向周王陈述夏亡之鉴和治国之道为主要内容。厚父谈到“民心惟本，厥作惟叶”，有学者指出，与传统“民本”思想论述角度不同，这是从哲学层面而论，意思是民众的心为根本，民众的所作所为是枝叶，即民心会影响民之为，如何赢得民心就显得尤为重要。厚父以此来讲治国之道，突出民心的重要

「德」字在商周的演变

□ 赵威

意义，提出应“保教明德，慎肆祀”“毋湛于酒”，这就与《尚书》中周公所不断强调的“敬德保民”和传世古文《尚书·蔡仲之命》中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有了理论上的一致性。

周天子作为执行天命的人自然具备了“德”之元素，这正是将天的意志降临到人的身上、将外在的行为内化为自身素养的契机。“德”从外在神化逐渐赋予了内在人性，内涵和外延逐步扩大，发展成以民为本的德政思想。

随着幽王崩亡、平王东迁，诸侯争霸、四海鼎沸，周代历史进入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崇德安民成为诸子百家重点发展的思想，也被诸侯国作为争夺天下的手段。关于以民为本的德政思想，孔子作了个比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有爱民之德，方为民所爱，这是永恒的定律。从周代开始，以德治国就是重要的政治理念，以德政为基础倡导廉政，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鲁桓公收受宋国贿赂他的“郕之大鼎”，并将其“纳之大庙”。对于这种非礼失德的行为，鲁国大夫臧哀伯批评说：“今灭德立适，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郕鼎在庙，章孰甚焉？”意思是说，国君毁灭德行，树立了一个坏的榜样，怎能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昭示百官呢？如果百官都来效法，国君又有什么办法、有何颜面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国君的放纵和贿赂风行的缘故。把郕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明显的受赐吗？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臧哀伯对官德、政德的认识是深刻的。官德是一种与权力相连的特殊职业道德，普通人无德，祸害的是自己和身边人，官员无德，伤害的是一方百姓。政德是关乎政权存亡、国家兴衰的根本问题。

《周书·毕命》中说，“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讲的就是地位越高、责任越重，越要时刻修身正己、身先士卒才能带好下属。

